

为中国孩子讲好故事

——谈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

王泉根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具有时代标杆意义,他们拥抱儿童,深入童心,扎根中国大地,紧贴儿童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感动和影响同时代的少年儿童,成为一代人共同记忆,成为常读常新的文学经典

社会发展瞬息万变,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为今天的孩子写作比以往更难,作家们需要沉下心来,真正深入儿童生活,熟悉他们的日常,了解他们的想法,体贴他们的内心,温暖心灵,鼓励成长

“心有榜样,就是要学习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美好事物”“过去电影《红孩子》《小兵张嘎》《鸡毛信》《英雄小八路》《草原英雄小姊妹》等说的就是一些少年英雄的故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要把他们立为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像他们那样追求美好的思想品德。”习近平同志列举的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儿童电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原创儿童文艺精品佳作的代表,这些作品深深影响感染几代孩子,成为他们美好的童年记忆,为中国儿童文艺打下了坚实而丰厚的现实主义传统。

儿童文学对塑造少年儿童精神世界、帮助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会让人终生受益,因而这种文学创作应当具有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与美学使命。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美好事物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与精神资源,是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审美设定。从抗战题材的《鸡毛信》《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小马信》和“大皮靴”叔叔》《满山打鬼子》《少年的荣耀》,到校园题材的《罗文应的故事》《草房子》《今天我是升旗手》等,当代儿童文学弘扬现实主义精神,塑造了一批典型人物形象,极大丰富了中国与世界儿童文学艺术形象画廊,成为滋养儿童生命的丰厚精神养料。

挖掘现实题材富矿

当前,在如何加强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如何更好塑造儿童文学典型人物、如何做做大做强儿童文学等方面,还有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和需要开拓的空间。

如有人主张儿童文学应当远离儿童所不熟悉的现实社会,不涉及成人世界的社会、政治、历史等内容,而应将“纯粹的艺术审美”作为儿童文学创作目标,因此像叶圣陶《稻草人》之类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并不是好的儿童文学,甚至是“最失败的一篇”。而那些大写“娃娃兵”的《小兵张嘎》等

抗战题材儿童作品,则“会使下一代时时渴望进入战争状态,以致不惜打破和平美好的日常环境,还以为这是在创造英雄业绩”,这样的观点是需要反思的。

叶圣陶最初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时,何尝不想写美好单纯的童年梦?他早期童话如《小白船》《芳儿的梦》等作品充满幻想,用理想主义的弹唱编织童话世界。后来他发现“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稻草人·序》)有了这样的觉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叶圣陶等一批作家将现实题材引入儿童文学。可以说,扎根现实是作家的良知与担当的必然选择,也是儿童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抗日战争时期,直面战争现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报告文学、戏剧成为儿童文学最发达的文体,小说如《鸡毛信》《小英雄雨来》、童话如《大林和小林》等,都受到广大少年儿童欢迎,而那些远离现实的文体和作品,则比较薄弱。新中国成立后,经受抗日战争洗礼的那批作家创作抗战题材小说,其本意于铭记历史、弘扬正义、珍重和平,儿童文学创作当然有其独特视角和自身规律,但这不等于要无视历史、回避现实,更不意味着儿童文学不能书写战争。

我们注意到,新世纪出现了新一波创作抗战儿童小说潮流,作家基本是“70后”“80后”,这些作家出生、成长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和平年代,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他们为何要书写战争环境中长大的少年儿童?他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80后”女作家赖尔小说《我和爷爷是战友》中,两位主人公“90后”高三学生李扬帆和林晓哲,感到迷茫、郁闷、找不到北。穿越到那一场残酷而壮烈的战争中,他们的灵魂受到洗礼。小说以感人艺术力量,鼓舞孩子们勇敢顽强、捍卫和平、追求光明。作家赖尔在小说后记中说:书写那个时代的故事,因为她发现其中蕴藏着许多值得今天孩子们思考的问题,有助于培养他们尚普遍缺乏的优秀品质,通过阅读这样的故事,孩子们“读到那个时代的价值,读到一种成长的责任。”从抗战历史中

余秀华诗走红之后

颜妍

得惟妙惟肖”,痛时“我身体里住着孔乙己”——身体的残疾逼迫着生活方式甚至思维都没有淡出过大众视线。一边是读者、媒体、诗歌界褒贬不一热议不断,一边是《月光落在左手》《摇摇晃晃的人间》等诗集接二连三出版,据说余秀华是近20年来除海子以外中国诗集销量最高的诗人。在文学很难再有轰动效应的时代,她是屈指可数的文学热点,而《无端欢喜》的出版让我们看到,在作为热点、作为事件过去之后,余秀华这个名字并没有随风而逝。

“网红”诗人余秀华的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前不久问世并且引发关注。事实上,自2014年年末突然走红起,余秀华一直没有淡出过大众视线。一边是读者、媒体、诗歌界褒贬不一热议不断,一边是《月光落在左手》《摇摇晃晃的人间》等诗集接二连三出版,据说余秀华是近20年来除海子以外中国诗集销量最高的诗人。在文学很难再有轰动效应的时代,她是屈指可数的文学热点,而《无端欢喜》的出版让我们看到,在作为热点、作为事件过去之后,余秀华这个名字并没有随风而逝。

和她诗歌有时是滚烫的抒情有时又是戏谑的反抒情一样,《无端欢喜》中的40余篇散文也很有性格:她写“成名”后既新鲜又苦恼的个人生活,写新农村建设中就在眼皮底下变化着的乡村,写完落落寡合的人情又去写飞扬跋扈的爱意,趣时“破罐子破摔,输

而余秀华并不是横空出世的一个,有多少王秀华、李秀华、张秀华正在不同的角落里写作?余秀华在那个叫横店的村庄里割草、喂兔子时,有人在手术台上执手术刀,有人在敲击键盘编写冰冷的代码,有人在机器轰鸣的车间件件作业,但当他们卸下日常生活的重担,开始写作,召唤出的却是同一种文学的真。他们是文学创作活力最朴素的来源。

“我们在洁白的纸上写的字”(《无端欢喜》中的一个篇名),这里不是敬惜字纸的古典式虔诚,而是任何人需要一个抒发空间时很自然的举动,不是面向“高大上”的文学经典,不是面向翘首以盼的读者群,不是面向出版发行、面向出名盈利,而是面向一张洁白的纸,写下最深处的惊心动魄。因为这些字既醒目,也可能歪歪扭扭,像余秀华因为身体的原因,写作时不得不左手压住右腕,如同犁地似的一道道翻出疙瘩坷垃,让人见了再难忘记。我们写在更高效、更及时、更博人眼球、更光怪陆离的介质上时,不要忘了那张白报纸承载的写作分量,不要忘了文学和生命息息相关。

正如在网络上最早发现余秀华的《诗刊》编辑所说,余秀华走红,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我们的纸笔在进步,我们的发表渠

寻找有益于当代少年儿童精神成长的宝贵资源,是这一批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愿景。

艺术重要使命之一在于以审美方式承载对人类命运和民族历史的思考。透过《我和爷爷是战友》《少年的荣耀》《纸飞机》等作品,我们看到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不断进取的良好态势,更看到民族下一代茁壮成长、欣欣向荣的希望。

重点书写当下

中国儿童文学选择现实主义不是偶然的,不是兴之所至,而是时代呼唤与社会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儿童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审美逻辑。

当前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有一种现象需要引起关注,即偏重“童年性”忽视“儿童性”。童年性是过去,儿童性是当下。童年回忆、童年经验、童年情结是作家创作的重要源泉,许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往往是作家“朝花夕拾”之作。近年来,抒写“我们小时候”的童年性已然成为一道亮丽风景,一批中老年作家推出《童年河》《童眸》《红脸儿》《吉祥时光》《阿莲》等精彩作品,这种创作潮流也催发一批年轻作家书写“我们小时候”故事的尝试。

作家们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总让人感觉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少了些什么。当作家们一股脑儿转过身盯着“自己小时候”,很可能就丢下了今天的孩子,而他们的生活和心灵更需要文学观照。社会发展瞬息万变,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为今天的孩子写作比以往更难,作家们需要沉下心来,真正深入儿童生活,熟悉他们的日常,了解他们的想法,体贴他们的内心,更多书写他们成长中经历的场景、遇到的困难,温暖心灵,鼓励成长。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一批中青年作家推出了多部有分量、贴近“儿童性”的现实题材作品,如董宏猷的《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牧铃的《影子行动》、陆梅的《当着落叶纷飞》、徐玲的《流动的课桌》、麦子的《小熊的女儿》、徐则臣的《青云谷童话》、胡继风的《鸟背上的故乡》、张国龙的《无法抵达的渡口》等。

加强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除了坚持细节真实之外,还须努力塑造典型人物形象。这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经验所在,也是新时代儿童文学新作为的重要课题。

鲁迅先生说得好:“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荣滋长的。”为了中华民族下一代健康成长,砥砺前行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新作为,加强儿童性,塑造典型人物,讲好中国孩子的故事,为中国孩子讲好故事,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做音乐的摆渡人

郑小瑛

我做指挥家的几十年,也是从事音乐普及和音乐教育工作的几十年。我主张交响乐、歌剧音乐同样应该为老百姓享有,“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1978年我担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复排意大利歌剧《茶花女》。正式演出时,剧场里熙熙攘攘,弱音凄美的序曲竟无法开始,有观众趴在乐池边问:“你们这是什么戏啊,怎么只唱不唱啊?”观众席里还有人大声聊天、嗑瓜子,这让我心里很难过。于是,我决定每次开演前20分钟,带着写有音乐主题的纸版和小录音机在走廊进行“歌剧音乐欣赏”讲座。在讲座上,我告诉大家,歌剧是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观看时要注意音乐形象和音乐表现。讲座受到听众热烈欢迎,有人在节目单上做笔记,还有人第一天没听全讲座,为此又去买了第二天的票再听讲座,等等。大家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感动着我,于是只要是我指挥,我就带着总谱、砖头录音机、演出服,挤公共汽车提前到剧院,讲完后直接下乐池进行指挥。其实,普及讲座并不容易,要避开生涩的音乐术语,做到深入浅出,每次准备都要经过一番斟酌。音乐没有具体形象,重在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意图以及基本知识,引导人们发挥想象力,这时候音乐家切忌炫耀学问。

几十年来我可能已经做了数千场音乐讲座和边演边讲的音乐会,有人称它为“郑小瑛模式”。现在我已淡出舞台,但还有很多人记得我,我觉得这不是因为我的指挥艺术有多高超,而是因为我很在乎观众。有一次我带乐团在杭州演出,一对老夫妻坚持要到后台见我,说忘了几十年前我在歌剧《卡门》演出前站在肥皂箱上给大家讲解的场景,为这次见面,他们特意带来一张小孙子学琴的照片给我留作纪念。还有一个孩子来信说:“那天在校园里偶然看到你们的演出,改变了我人生的追求。”这样的反馈带给我的幸福感真是无以言表。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几位女音乐家创建我国第一个志愿者室内乐团“爱乐女”,把许多中外经典音乐送到各地大学,五年里演出300多场。2005年,殷承宗邀请我到美国卡耐基音乐厅合作《黄河》,硅谷的华人合唱团知道后,坚持请我到旧金山做一场讲座,原来他们很多人都曾是“爱乐女”室内乐团的听众。2009年我带厦门爱乐乐团在旧金山演出刘漫作曲的《土楼回响》,当需要与当地合唱团互动时,他们竟组织了240人的中西合唱团共唱客家之歌——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几十年来,正是广大观众的反馈和需要激励我“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我也在分享中收获人生价值。人民音乐家洗星海曾在多个群众合唱团教唱抗战歌曲,在抗日剧社开演前和闭幕后热情洋溢地教观众学歌;我国交响乐团奠基人指挥家李德伦也做了许多音乐普及工作,他常常用风趣的语言带动起人们对音乐的兴趣。这些前辈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如今的音乐会常常有专人来做“导赏”,但如果指挥家自己解说,一定会增添亲切感和信任感,因此,我总是动员学生们到观众中去。

在国内我推动经典交响乐和歌剧普及,在交响乐未被开垦的地方建立乐团;在国外我坚持在柏林爱乐大厅、马林斯基剧院音乐厅、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等国际一流音乐厅,向西方主流社会展示中国交响乐作品“洋为中用”的优秀成果。比如表现客家精神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已在12个国家演出了71场,很受欢迎。

近年来我的工作主要是努力推动“洋曲中唱”。现在国内流行用原文演唱舶来的歌剧。唱原文固然有其价值,但是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洋曲中唱”更为所需。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唱各国“原文”,旁边的纽约城市歌剧院就只用英文演唱各国歌剧;英国皇家歌剧院演唱原文,旁边的英国国家歌剧院也只用英语演唱——我们呢?我国各地声乐教学多以照搬洋文为荣,许多演出以唱原文为“上品”,为此不惜砸下重金,不顾有些演员并没有透彻掌握原文,台下观众更不知台上所唱。上世纪80年代,我和中央歌剧院合作的用中文演唱的《茶花女》在天津40天里上演39场,每场观众2000余人,场场爆满。我相信只要艺术家用心,就会出现更多“洋为中用”的精品,带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喜欢上歌剧。我坚定地认为,与能否在国际大赛中获奖、能否跻身国际歌剧舞台相比,更有价值的是把在外面学到的知识、技巧以及科学理念,“洋为中用”地服务好中国百姓、做好基础音乐教育。

我今年已经89岁,还想为身边的中小音乐老师做一点指法基础的培训,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接棒音乐普及工作,通过几代人共同努力,为国民音乐教育再做一点实事。

(本报记者徐馨采访整理)

郑小瑛,1929年出生于上海,闽西客家人。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教育家。上世纪60年代留苏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为世界合唱比赛荣誉艺术主席团永久成员,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和两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金钟奖”终身成就奖等。

